



从《青年马克思》看青年人的时代担当

□ 张慧瑜



近期，一部从欧洲引进的电影《青年马克思》在国内热映，很多观众从这部电影中了解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结成革命友谊，又是如何完成《共产党宣言》的。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部题材特殊的电影，没有让观众有说教之感，两位伟人的青年故事既没有被无限拔高，也没有陷入凡人琐事，反而用现实主义的风格，一方面塑造了他们思考人类命运、与观点不同的人论辩的理论家风采，另一方面呈现了伟人也要面对养孩子、被驱逐、无钱付房租等生活窘迫。相比其他商业化的青春电影，这部传记片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理论含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扮演者准确地表现出了青年人的理想、自信和担当。这给当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次进入19世纪、感受共产主义“初心”的契机。

首先，这部电影的时代感很强。相信很多中国观众对电影中出现的地名，如德国科隆、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并不陌生，甚至到这些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欧洲名城旅游过。只是电影中所“还原”的是19世纪中期的欧洲，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电影一开始呈现了两种社会“压迫”，一是博士毕业担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批评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农民、贫民的压榨，指出表面上公平的法律实际上保护的是既得阶层的私有利益，《莱茵报》被军警查封，马克思也被逮捕和驱逐，从此带着妻女走上漂泊之路；二是在英国帮父亲管理工厂的恩格斯，亲眼目睹了一场工人自发组织的反抗工厂主，也就是恩格斯

父亲的斗争。被机器损伤的工人不仅得不到资本家的赔偿，反而要补偿修理机器的费用。恩格斯利用家族之便，在英国纺织业的核心曼彻斯特地区进行工人生活的调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工人阶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工业革命、工业进步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反而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受害人。如果说马克思遇到的是政治压迫和专制审查，那么恩格斯所看到的则是工业生产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这种工业化大生产、社会两极分化的时代就是孕育、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背景。

其次，这部电影有很深的理论思辨色彩。对于当下看惯商业片的青年观众来说，卿卿我我、打打闹闹或者玄幻离奇、外星战舰等娱乐元素才是电影的常态，而《青年马克思》的特殊之处，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考、理论追求作为故事发展的核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偶遇到相识，再到变成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过程中，共同的理论兴趣是他们友谊的基础，比如在酒馆中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应该学习英语，去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边沁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也成为后来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批评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神圣家族》。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逐渐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电影中他们不惧权威、追求真理，与同时代的哲学家进行辩论，如蒲鲁东、巴枯宁、魏特林等。面对当时法国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马克思专门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来回应他的新书《贫困的哲学》。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重视理论研究和学习，理论是认识现实和世界的工具，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体现了一种坦诚交流和知识共享的精神。

最后，这部电影展现了一种青年

人的重要品格，就是知行合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遇、畅谈之后，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之前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我们要改变世界。这等于宣布马克思要与西方哲学传统告别，实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在电影最后，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当选为代表，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看法，还提议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修改为“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最终同马克思一起完成《共产党宣言》这本指导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敏锐洞察，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列宁、毛泽东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让社会主义革命变成现实，改变了众多被压迫者的命运，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实干精神。斗转星移，生活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时代的青年人，有时会裹足于自己的小圈子、小时代，在小确幸、小确丧中自怨自艾，就难以呈现出电影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不足30岁的年轻人所携带的锐气和自信心。

经历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21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段让几代人为之前仆后继、共同奋斗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核心角色。《青年马克思》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追求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何会诞生在19世纪，这也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铺就新篇章。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青年人一方面应该勇于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研究社会，另一方面也要有实践精神，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因此，《青年马克思》不光是一部历史片，更是一部朝向未来的电影。



人生

马克思

瞬息云烟，
为时多么短暂，
被时光带走的一切哟，
永远不再归还。

生命有如文火徐燃，
死亡将是永恒久远，
因需要而产生的一切哟，
正是我们的意愿。

眼前的万物，
即将消失，
理想和激情，
也会化作虚无的云烟。

对你从事的事业，
魔鬼可能在一旁讥笑，
千百万人拼命争夺，
也许是无谓的辛劳。

心乱气恼，
是一切祸患的根苗，
惊慌烦扰，
意谓“幸福已经逃逝”

无聊的目标，
也可能被人苦苦追求，
转眼即逝的人生，
正是一次激情的战斗。

心胸狭窄的人，
往往自命伟大不凡，
这种人的命运啊，
只有自怨自惭。

选自《马克思诗歌全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工业强国建设，制定并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步伐明显提速。

这些成就的取得，有其深刻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文艺工作者，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我国工业发展史以及随着工业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进行文学性的思考、梳理和提炼，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我国的工业发展史、新中国工业成长史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工业腾飞史，为工业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为繁荣我国文学艺术，为文学爱好者和专业作者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我们现在有必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研究。

研究我国文学艺术史，必须要放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之中来思考。我们的先人和前辈，为人类农耕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创作出了流芳百世、声震四海的艺术瑰宝，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工业的发展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之下，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之下开启了。清末民初，曾国藩、张之洞、孙中山等开始憧憬中国工业发展之路。但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打压，这条工业发展之路步履维艰，在夹缝中求生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工业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

新中国开创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工业化建设，用70年的时间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据联合国最新统计，“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航天、航空技术世界瞩目，我们的复兴号高铁成为国家新的名片，我们的钢铁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颗小小的铁钉被称之为“洋钉”，民众的生活必需品火柴被称之为“洋火”。而现在，浩瀚的宇宙中有我们的卫星飞船，广袤的大洋深处有我们的深潜器，最大的轮船由中国制造，最快的火车属于中国制造等等，不胜枚举。用人类发展史的坐标来衡量这70年的发展，无疑是人间奇迹。中国工业发展的实践打下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全新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的诞生提供

由工业文学想到的

□ 廖 奔 赵文民

了可能和必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工业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向性指导，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我们在为沿线各国提供基础建设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把70年来的经验、制度、精神等工业文化传播出去，对沿线国家自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工业文学作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文化最为直接的代表，将和其他种类的文艺作品一起，共同讲好中国工业故事。

新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波澜壮阔的工业发展史蕴藏着丰厚的底蕴，每一个大国重器的诞生都有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去挖掘、整理和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的“基层”，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管理者、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扎根的“人民”。工业题材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我们要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文化、文艺的独特优势，用“中国优秀现代文化”来归纳、梳理、总结、提升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人类工业文明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经验。



读研究生时，我的同屋师兄孙郁对我说：“永清，你对文章的感觉不错。”孙师兄大我8岁，为人与为文都好，他的话在我心里是有分量的。

研究生毕业时，我就找了份与文章打交道的工作，到《艺术广角》杂志当编辑，从此开始了至今为止的30年编辑人生。

如今，《艺术广角》杂志已少有人知道了，但在1988年时，《艺术广角》却是全国文艺理论圈子里举足轻重的杂志。那时的《艺术广角》真的是聚集了一批人才啊。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感到幸运，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艺术广角》当编辑。我除了学到了当编辑的基本道理，还学习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艺术广角》工作那些年，我也做了很多事情。作为编辑，我编发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业余时间，我还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文章还获得了辽宁省文学理论评论奖，并且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尽管《艺术广角》是一份在专业领域有着重要地位的杂志，但它其实很穷，靠财政拨款生存，职工的待遇也是比较低的。在我入职前，领导和我谈话时就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可我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这里。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都是这样，为了喜爱的工作，几乎不考虑物质利益。

我的第二个单位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之所以要离开《艺术广角》，主要是我觉得刊物的社会影响还是不大，只是在专业圈子里有影响，对社大群众，则基本上影响不到。我还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大众有益。这是我的济世情怀吗？也许是。我要编书，编好书，用好书来影响大众，滋



□ 臧永清

三十年编辑人生

润他们的心田。

从1995年10月调入，到2001年3月调离，我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了5年半。工作部门不断在变，做《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编辑，做发行部副主任，做《旅伴》杂志副总编，做文化生活编辑室主任。但有一个心愿始终没变，那就是编书，编好书。其实，在杂志社工作、在发行部工作，都没有编书的任务，我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编书，来出版社干嘛？几年间，我还真的策划、编辑了一批不错的书。比如《中国藏书楼》，选题是我们自己策划的，主编任继愈、执行主编肖东发，是我们登门拜访磨下来的，这套近200万字的书，我们持续编辑了4年，后来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2001年3月，辽宁出版集团任命我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协助社长兼总编辑韩忠良分管编辑、营销工作。在外人看来，这绝不是一个好差事。当时这家老牌文艺出版社债务近3000万元，资不抵债。更重要的是，全社共二十来人，还主要是行政人员，在岗又在编的编辑一个都没有。没钱又没人，怎么办出版社？

不过，我倒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一个美差。我本科、研究生读的都是中文系，到文艺出版社工作算是专业对口。还有一个原因，1988年我23岁

时，春风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我与人合译的长篇小说《硬汉不跳舞》。能为这样一家帮助过我的出版社做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件幸福的事。

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累并快乐着。累是真累。我们是背负着巨额债务恢复生产的，在规划了产品线之后，我们便到处组稿。光组稿还不行，还要亲自看稿、改稿。我现在依然记得严冬时节的后半夜一个人坐在自家空旷的客厅里审稿时的困和冷，并且，不是一两天，而是长期如此。我依然记得我带着发行部的同事远赴昆明参加民营书业订货会的情形。已过了午夜，我和同事们还坐在展厅里等客商，希望多收些现金回去，家里等米下锅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激情支撑我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

快乐那也是真快乐。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第2年，春风社就全面好转，并推出了当年赫赫有名的畅销书《省委书记》。这本书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拿到这本书的版权太不易，算上春风社，全国有7家出版社在争夺这本书。在7家竞争者中，我们是最弱的，但是我们用营销方案赢得了陆天明先生的信任。那确实是一份处处闪烁着创造火花的营销方案，它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评为2002年全国七大优秀图书营销方案之一，并

名列榜首。

到中信出版社工作是2004年10月。中信当时主要是做经营书，并且多数是引进版的，这对我完全是陌生的领域。因为陌生，就有挑战，我愿意接受挑战。

在中信出版社，我分管过多种工作，管过发行、营销、印制、本土经营书、非经营书等等。中信出版社崇尚以营销拉动销售的理念，所以，我分管的企划部，工作就很辛苦。只有两三个人，一年中却要办100余场店面推广活动，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见。我也常常冲到一线参与营销活动，经常是周末往京外跑，有两次竟然没赶上早班飞机。我实在太累，起床晚了。

还是喜欢做书。尽管本土经营书并不是那时中信出版社的做书重点，我还是希望把自己分管的领域做好。我参与了一批优秀本土经营书的出版工作，我至今记得200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那天晚上，为了确定《联想风云》的书名、封面，王斌社长、我、潘岳，一直在忙，收工时，已是2005年元旦凌晨。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迎接新年。

本世纪最初10年，是经营书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经营书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信出版社抓住了这难得的机遇，迅速壮大了

自己。作为短暂的参与者，我充分感受到了大时代对于企业巨大的助推力！

2008年2月，我到现代出版社工作，先做总编辑，后来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至今还兼着它的社长。

这些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畅销书。当然，现代社也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奖项，如“中国好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鲁迅文学奖等等。

现代出版社能得到快速发展，除了同事们的辛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触摸到并且把握住了读者审美的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在日子过好了之后，人们对精致的休闲阅读有着强烈的需求。现代社的几条重要产品线都是顺应读者审美需求变化而打造出来的。这也许就是出版的时代性吧。

在现代出版社工作期间，我被推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当编辑当出个全国政协委员来，实在不易！

当我觉得在现代出版社越做越顺、越做越轻松时，中国出版集团的任命来了。2017年2月，我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我惶恐不安。这是怎样的一家出版社啊，它自1951年成立起，出版了一大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滋润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的心灵。在中国，只要是读过文学书的人，谁能说

没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呢？它的所在地，朝内大街166号，早已成为新中国的文化地标。我如何当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十一任社长呢？

一年多来，我的关注点还在做书。当然，作为社长，我的工作规划怎样做书。我相信做好书会让我们实现所有梦想。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积累了丰富的优质版权。人文社的古典文学著作无论版本还是校勘质量，都是最好的；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名著，译者都是翻译名家、大家。这些优质版权是人文社之芯。

一年多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销售规模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多，更可贵的，是我们好书不断，读者和同行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继承了人文社踏踏实实做好书的传统，我们还要放进去一些现代出版理念。唯此，我们才能长久地伫立在时代的潮头。

30年来，我一直在编辑着文字，也一直在用文字编辑着人生。我们用文字记录了时代，也用文字书写了自我。这样想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